

论社会学方法的发展趋势

林 彬

通过对近几十年社会学方法论和研究方法的系统考察, 作者认为: 随着实证主义方法论和西方主流社会学的衰落, 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调查方法更为多样化、社会学方法论更具综合性。这种综合性表现在: (1) 对实证科学的重新理解; (2) 对社会规律的重新认识; (3) 各种对立的研究方法, 特别是微观与宏观、客观与主观、定性与定量等研究方法的综合与相互补充。除以上几个方面外, 今后我们还应当注重静态与动态、学术研究与应用研究这两个维度的方法论综合, 并在此基础上促进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进一步发展。

作者: 林彬, 男, 1952年生,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师。

60年代以来, 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论发生了一些实质性变化。继结构功能主义衰落之后, 形成了各种理论学派相互竞争的局面。近年来随着自然主义与人文主义、自然科学与释义学的整合, 社会学方法出现了新的综合趋势。本文试图通过对近几十年方法论和研究方法的考察探讨社会学方法的发展趋势。

1. 社会学方法不仅仅指研究方法, 更主要是指研究逻辑和基本假定, 即方法论。这两者是紧密联系的。正如在经济学中普遍应用的数学模型方法是与新古典学派的“经济人”和“效用最大化”的假定相适应一样, 与本世纪中期主流社会学的方法论相适应的是由迪尔凯姆(E. Durkheim)、拉扎斯菲尔德(P. L. Lazarsfeld)、布莱洛克(H. M. Blalock)等人发展的实证研究方法, 特别是统计调查、多变量相关分析和数学统计学模型。

从方法论上看, 以帕森斯(T. Parsons)的结构功能主义为代表的主流社会学“在社会科学逻辑框架上是自然主义与功能主义”。吉登斯(A. Giddens)称其为社会学的“正统共识”。^①“正统共识”的基本特征是: ①主张趋同论, 即认为任何国家都会通过不同途径从传统社会发展到相似的工业化社会; ②采用多功能分析的方法, 即通过对每一制度或文化现象在整个系统中的功能的分析来说明社会各部分之间的稳定联系; ③建立在实证主义和方法一元论的基础上。^②从研究方法上看, 主流社会学的特点如下。①强调客观的、实证的方法。这里的“实证”是广义的, 它不仅包含孔德(A. Comte)意义上的“实证”, 也包含20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和波普(K. R. Popper)的证伪主义。实证方法的核心是操作化, 其中心思想是: 理论概念必须能由经验指标加以量度, 只有这样, 经验事实才能在抽象层次上被分析并能对理论作出检验。②侧重定量分析和因果解释。主流社会学试图象自然科学那样对事物

① See A.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Berkeley: California Press, 1979, p. 241.

② 参见I. C. 海斯: 《当代西方社会学中自然主义与反自然主义之论争》, 《社会学研究》1990年第5期。

进行精确分析和客观解释,以便建立演绎性的理论体系。因而他们普遍以迪尔凯姆在《自杀论》研究中创立的变量分析方法为楷模。③注重静态分析和宏观研究。结构功能主义是以社会系统论为其分析模型的,社会系统分析侧重系统的平衡与整合,强调社会的静态特征和宏观结构特征。

主流社会学的上述特点是与本世纪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进展相联系的,在英克尔斯(A.Inkels)所列举的方法进展中,定量化和操作方法占主要地位,例如,人口统计学方法(1934)、利克特量表(1932)、格特曼量表(1944)、贝尔斯的“互动过程分析”(1950)、科尔曼的“随机模型”(1964)、布莱洛克的统计学模型(1969)、邓肯等人的“路径分析”(1966)、怀特的“马尔科夫链模型”(1970)、古德曼的“对数线性方程”(1978)、伯特的“社会网络分析”(1980)以及“态度调查和民意测验”等等。①本世纪中期对实证主义和定量方法的强调不仅是社会学,而且是整个社会科学的主要特征,如经济学的数学模式、计量历史学、政治学和人类学的定量研究都是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社会科学的实证倾向反映了二次大战后兴起的科学主义和工业主义的世界观,并得到了新技术革命和自然科学成果(特别是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有力促动。

70年代,社会学的“正统共识”开始解体,其原因有多种。首先,是由于反实证主义学派——符号互动论、现象学社会学、知识社会学、民俗方法学、批判理论——的冲击,这些学派的共同点是强调社会行动的主观意义,反对自然主义的决定论。其次,是由于科学方法论的发展。科学哲学家波普、库恩(T.Kuhn)、拉卡托斯(I.Lakatos)、费伊阿本德(P.Feyerabend)等人将发展观、历史观和非理性因素引入方法论,打破了方法的规范性和一元论的神话。但更主要的原因在于结构功能主义不能对60年代的社会动荡和社会冲突作出有效解释。可以说,实证主义的衰落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它反映了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危机。马尔库塞(H.Marcuse)的“单面人”、哈贝马斯(J.Habermas)的“合法性危机”、亚历山大(J.Alexander)的“计算机文化”,都说明了技术统治意识形态下的社会现实,说明对当代社会各种危机的认识需要结合对人的历史境遇和文化世界的理解与洞察。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社会学家开始更多地借鉴哲学和人文科学的方法,特别是释义学、现象学、语言学、文化人类学、语义哲学和认知理论的方法。

由以上的简略考察可以看出,方法论、研究方法和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联系。研究方法主要是技术手段,它可以在科学领域中独立发展,如统计方法、数学方法等。但是将哪些研究手段引入到一门学科的研究领域,则取决于方法论倾向和社会需要,这种倾向或需要反过来又会对研究方法的发展有很大促进作用。同样,方法论在哲学和科学领域的发展有其内在规律性,但这种发展既受到社会现实的制约,又会改变人们对社会的认识。近年来,社会学方法论的变化不仅受到当代科学哲学和社会变迁的影响,而且也反映了社会学家对社会和科学的重新认识;同时,它还在某种程度上指示了研究方法的发展方向。

2. 当代社会学方法论的对立与综合表现在不同层面上。

在科学方法论上,有关实证主义的争论主要集中在理论与经验事实的关系上,继19世纪思辨哲学与经验(或实证)社会科学的分离以及20世纪中期逻辑实证主义与证伪主义的争论之后,目前大部分社会科学家在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论”或后实证主义的观点上达成了共

① 参见A·英克尔斯:《社会学60年—1900年至1965年重大进展评述》,《国外社会学》1988年第1期。

识。这种观点认为,科学理论必须建立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上,但经验事实并不能完全验证理论;理论的有效性或理论进步不能由对具体理论的孤立评价中得出,而必须通过对“研究纲领”(或“范式”)的竞争和转换来解答。^①这种认识对极端的操作主义是一个沉重打击,但它并未退回到主观唯心主义和怀疑论。科学的基本方法仍然是实证方法,它诉诸于经验观察和科学家在研究逻辑与程序上的共识。在,而且仅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科学家才承认方法的一元论。

在社会学方法论的层面,自然主义与反自然主义争论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研究是探求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普遍规律,还是仅仅概括在社会行动中表现出来的经验规则。部分是由于对“规律”一词有不同的理解,社会科学家对这一问题没有一致意见。但通过争论,他们对于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异同有了比以往更深刻的认识。

社会现象显然具有规律性,但这种“规律”与自然规律不同,它涉及人的行为动机和目的性。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现象具有历史性和非重复性,因此社会科学不可能象自然科学那样作出无条件的预测,而只能作些有条件的预测。波普指出,社会科学的主要任务不是依据客观规律去“预测”未来,而是“探索人类有目的的活动的出乎意料的社会反映”。^②例如,当人们试图用行政力量去消除经济不平等时,却发现由行政权力所导致的分配不公加剧了。这种对社会“规律”的认识为超越自然主义与反自然主义的对立指明了道路。

在社会学研究的层面,以往的方法论争论主要表现在:①因果解释与投入理解的对立;②宏观社会学与微观社会学的对立;③“价值中立”与“价值相关”的对立;④理论研究 with 经验研究或规范分析与经验描述的对立;⑤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的对立。这几个维度虽然不尽相同,但却具有明显的相关性。近20年西方社会学方法论的整合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①宏观与微观的综合。60、70年代由于“正统共识”的危机导致了由宏观到微观的整合,即结构功能主义与符号互动论的整合。随着微观社会学的发展,到80年代初期又出现了由微观到宏观的整合。^③这种整合表现为:柯林斯(R.Collins)等人的“聚合”假设、哈雷(E.Halley)和吉登斯等人的“结构—行动统一过程”假设、西库雷尔等人的“描述”假设。这三种观点都试图从微观互动过程出发重建宏观社会学。^④②解释与理解的综合。将“解释”与“理解”作为自然科学与社会人文科学相区别的主要特征,起源于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并一直为社会科学家所认可。近年来这种区分受到了广泛指责。科学哲学的进步说明,在自然科学研究中也同样要运用理解或阐释的方法。更进一步说,理解不仅仅是一种认识方法,它也构成人类活动和科学活动的本体论要素。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的概括不仅仅是对人类行动的理解,它也同样包含因果说明。本世纪初,韦伯曾试图将这两类方法综合起来,他在研究中使用了投入理解法、发生学解释、历史的因果解释、类型学解释和规范的理论陈述,但由于实证主义的兴起,这种尝试未能继续下去。

目前,尽管在理论上消除了解释与理解的对立,但在实际研究中仍很难将自然科学方法与释义学方法很好地整合起来。同样,在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关系上也存在类似问题。这种结合的困难主要来自社会现象的“复合性”或社会结构的“双重性”。^⑤因此,方法的整

① 参见I·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94—97页。

② K·波普:《猜想与反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487页。

③ 参见J·里茨尔:《美国社会学理论的历史、现状及展望》,《国外社会学》1989年第2期。

④ See K·Knorr-Cetina and A·Cicourel, *Advances of Sociological Theory and Methodology*, 1981, p.60.

⑤ See A·Giddens, *New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London, 1976, p.160.

合不在于制定统一的社会学方法，而是要根据所研究的具体现象和所依据的具体理论来选择适当的研究方法，并使各种方法都能充分发挥作用。

3. 在方法论中，除以上几方面外，还有两个未被充分讨论，但有可能成为今后发展趋势的维度：（1）共时性与历时性；（2）学术性与应用性。

社会学与历史的关系历来很密切，早期的经典社会学家都十分重视社会现象的历史性。但是由于主流社会学对历史哲学方法——即脱离经验研究的宏观洞察——和社会进化论的批判，历时性研究受到排斥。结构功能主义只强调系统分析和静态分析，而微观社会学派则强调情境分析和语义分析，它们都把社会结构和文化规则当作“既定的”现实，即使有变化，也仅仅是结构的分化和情境(或语境)的差异。它们都忽视了结构变迁和文化变迁所导致的社会基本特征的变化，忽视了结构的“突生性”或“断裂”。福柯(M.Foucault)在《知识考古学》中对这种“断裂”进行了深入探讨。他认为，各个历史时期的思想、学说、知识之间的关系不是线性的、连续的，而是断裂的、不连续的，象考古学的层面一样。在同一层面，社会制度与组织结构也具有同样的“断裂”特征。^①吉登斯主张将不同于康德(I.Kant)的新时空观与“结构化理论”结合起来，在不同的时空环境中考察结构的产生与再生产。^②上述观点有可能超越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对立，并在两者之间保持一种新的张力。

现代社会是以急剧的社会文化变迁为基本特征的，因而历时性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发展方向上看，现代的“社会动力学”应当包括静态—动态、宏观—微观、解释—理解这几个维度。首先，结构分析应当与过程分析相结合。也就是说，在研究方法上要将现有的统计学模型（如“路径分析”、“网络分析”）与“协同学”和“突变理论”结合起来。因为在结构变迁中，一些“突生”的变量可能会起到“稳定因子”的作用。其次，在历时性研究中既要重视宏观结构变量和历史变量，也要重视微观变量的影响。在分析各种变量的影响时，需要将历史社会学方法与微观社会学特别是社会人类学方法结合起来，因为结构的突生属性也往往反映在群体关系和社区结构中。最后，历时性研究既要考察大规模社会变迁，也要说明生活世界的变化。对于前者可采用归纳法进行因果解释，对于后者则需要借助个案法和主观理解，在这方面，生活史和事件史分析将发挥重要的作用。但个案研究的作用并不局限于对个别事物的理解与体察，它还有助于确定各种“意义系统”和“认知类型”的特征。福柯的研究就是要发现各种“认知类型”与社会机构的关联性或结构一致性，并在没有历史分期的时空中提供一种摆脱了人类学的历史分析方法。^③

在方法论中，“学术性”与“应用性”主要用来区分在不同领域或对不同角色所进行的社会研究，这一维度与“价值中立”和“价值相关”、“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有一定相关性。实证主义者主张科学的“价值中立性”，强调知识的经验性，认为只有这种知识才能象自然科学知识那样应用到现实中。近年来的方法论讨论不仅批判了上述观点，而且还涉及了这一维度的更本质的内容，即社会科学与其研究对象的关系问题。例如，哈贝马斯将知识区分为经验—分析知识、形而上学和历史知识以及批判知识，它们分别满足不同的社会功能需要。他的这种划分是想要说明，当代科学（即经验—分析知识）已成为一种为国家或统

① 参见叶秀山：《论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

② See A·Giddens, *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chf.6.

③ See M·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New York, 1972, p.17.

治阶级利益服务的工具。亚历山大则把科学视为在经验环境与形而上学环境之间运行的“连续统”，即从抽象的形而上学到具体的经验研究。他认为，各种层面的研究都有其独立的规则、方法和评判标准。他反对把科学视为一种意识形态，同时也反对把社会学视为一种仅仅提供理论命题和事实陈述的实证科学。吉登斯再进一步指出了社会科学的“双向释义”性，说明了在社会知识的形成与应用过程中，不同社会角色（研究者、决策者和行动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

上述观点给了我们如下启示。①社会科学不仅仅是对社会现实的单向认识，它本身还参与了社会现实的构造与再构造。换句话说，在研究者的概念体系与行动者的世界观及实践活动之间存在一种双向的、辩证的关系。②在这个意义上，有关现实的应用研究与理论研究都不是“价值中立”的。例如，实用主义和政治功利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策研究和经验研究的主题，许多理论研究和历史研究都用来为意识形态及现存秩序辩护。另一方面，社会研究也常用于创建新的社会制度。③从元科学的观点看，人们是能够建立一种摆脱价值观念和经验主义束缚的哲学方法，其作用是依据经验观察和归纳法来发展科学的分析能力和解释能力，并借助哲学思辨和逻辑推理来提高人们的批判能力和反思能力。“这种哲学方法的基础可能是现象学方法……（它）广泛地应用语言分析，并最终求助于归纳科学的成果。”④在这一层次上的理论和方法论研究称为形而上学。因此，学术研究可分为形而上学与经验科学两个层次。可以认为，当代社会学方法的发展取决于形而上学或哲学方法与各种实用技术和操作方法的有机结合。

总之，由于当代全球性的社会问题和急剧的社会变迁所导致的文化与理性危机，社会科学在今后的政策制订和社会改革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这一趋势相适应，社会学将日益摆脱自然主义的影响，并与马克思、孔德、韦伯等经典理论家的下述观点相认同，即：社会学应当为人类提供理解现代社会的钥匙，这种理解一方面是以实证研究为基础，另一方面要运用社会学的想像力和历史洞察力。

责任编辑：唐 军

① J·鲍亨斯基：《当代思维方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4—145页。